

缪荃孙致陶澐宣手札七通辑考

张慧禾

浙江图书馆藏有缪荃孙致陶澐宣^①手札七通,书信时间自光绪十二年(1886)至光绪二十年(1894),集中于缪陶二人密切交往的八年;书信内容涉及金石辑录和收藏、缪陶二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状况等。不但较全面地反映了缪陶二人交往的过程,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光绪年间官场、科场的黑暗和腐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。

—

心云仁兄同年:

正拟走谈,而尊使适至。凝禅寺三级浮图碑(价貳千),达牧碑书经在房山宋刻(价五百),苏^②书道德经幢(价十千),均系寻常之物。诵凡^③用钱甚多,何以报之。房山石经俟碑估来再议。子封^④定入词林,舍弟则分部而已。此及。弟缪荃孙顿首。

①陶澐宣(1846-1912),原名祖望,字文冲,号心云,又号稷山居士,晚号东湖居士,浙江会稽(今绍兴)陶堰人。同治六年(1867)并补行甲子科副榜,光绪二年(1876)科举人。光绪十二年(1886)会试挑取方略馆誊录,后出任广东广雅书院山长,又任职于湖北志书局。光绪二十年再次会试失利后,绝意仕途,回乡隐居。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东湖书院,后改东湖通艺学堂。著有《稷山论书诗》、《稷山狮弦集》、《稷庐文集》等。

②苏即唐代开元、天宝年间著名书法家苏灵芝。天宝中(约750)任易州(今河北省易县)录事参军。

③诵凡,即徐树兰(1837-1902),字仲凡,号检庵,浙江山阴人。清光绪二年举人,授兵部郎中,以输资为候选知府,补用为道员、盐运使。不久以母病归里,不再出仕,以诗书自娱,尤以购书、印书、藏书为乐事。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,筑捍海塘,建西湖闸,创设豫仓。光绪二十三年捐千金开办绍兴郡中西学堂,开绍兴近代教育之先声,后改为官办绍兴府学堂。又出资兴建古越藏书楼,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。

④子封指沈曾桐(1853-1921),浙江嘉兴人。号同叔、广严老人,室名广严精舍、醉六堂。沈曾植的弟弟。光绪十二年进士。授编修。曾任湖北考官,甲午后忧愤国事,常与同僚议论朝政,主张变法维新,提倡西学,支持康有为开强学会,列名为发起人。

张氏书两种即以奉赠,祈哂收。

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载,光绪十二年(1886)二月底,陶澐宣入京会试,住浙江会馆。此次会试,陶澐宣虽落第,但仍分部考取了方略馆誊录^①,任职京师,居京师半年,直至仲秋节后方离京入沪。与陶澐宣同年参加会试的沈曾桐,中进士后于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选庶吉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故此信写于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前后。

《凝禅寺三级浮图碑》,东魏元象二年(539)立,在河北元氏县白楼村东北凝禅寺故址,东魏著名碑刻。康有为定此碑为“能品”,说它“如曲江风度,骨力峻整”^②;杨守敬也认为此碑“书法劲拔,易方为长,已开渤海前驱,篆额亦奇”^③。但缪荃孙的看法与众人不同,认为此碑与《达牧碑书经》和苏灵芝书写的《道德经幢》一样,皆不过寻常之物。

《道德经》至唐中叶始有刻石。唐代著名书法家苏灵芝所书《道德经幢》,通常被认为潇洒飘逸中有刚劲之力,端雅俊秀中有铁骨之风,笔法流通,现存河北省易县龙兴观内,是中国现存的4个道德经幢中形体最大、年代较早,保存也较好的一个。但缪荃孙和叶昌炽^④与常人看法迥异:“书学至唐极盛,工书而湮没不称者,尚不知凡几。况煊赫到今,其必无滥竽可知矣。然有三人焉,循名核实,不无遗憾。”^⑤其中之一就是苏灵芝。叶昌炽认为苏灵芝的碑以《梦真容》为第一,惟此尚可学,所书《道德经幢》则不值一学。

《房山石经》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的略称,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。陶澐宣《稷山论书诗》:“房山字字天然媚,古洞千年閤石华。读罢泥洹经七卷,浑疑笔底发莲花。”^⑥《房山石经》阅世千年,都字数万,端严明丽,内外光滑如芙蓉之出水,字体不一,并皆佳妙,非特法林之宝藏,亦艺苑奇珍也。当时北京厂肆卖碑拓的商人,去拓碑的同时还时不时携带一两块残石进京,所以叶昌炽在当时就担心“恐毁灭者已不少”。

①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光绪十二年(1886)四月二十八日:“诏:此次散馆二甲庶吉士郎松年、张筠等三十九人俱授编修;三甲庶吉士蒯光典等五人俱授检讨;李荫奎等十六人俱以部属用。”

②康有为:《广艺舟双楫》卷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89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

③谢承仁主编:《杨守敬集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,1997年。

④叶昌炽(1849-1917),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。字颂鲁,号鞠裳,晚号“缘督庐主人”。著有《语石》、《缘督庐日记》、《藏书纪事诗》等书。

⑤叶昌炽:《语石》卷七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年,第200页。

⑥陶澐宣《稷山论书诗》,又名《论书绝句》、《百首论书诗》,手稿今藏绍兴图书馆。

二

心云仁兄同年：

失近甚歉，近日疲乏已极，国学之游须再定日。诵凡收游资否？此及。

弟荃孙顿首。

关于此次国学之游，陶濬宣曾致信缪荃孙，相约在游完西山之后^①。北京西山之游，据《艺风老人年谱》记：“光绪十二（1886）年，供职京师，李莼客、陶心云、徐诵凡招游西山。”清代金石学极盛，学者们搜集、整理金石文献，并以之考订经史，补苴文集，论书法源流，蔚成风气。到晚清更加发达，以至于当时学者，如不通金石之学，即不齿于通人之列。“荃孙通籍以后，交游日繁，同好日多”^②，当时治金石之学的大部分学者都与缪荃孙往来甚密，其中亦包括陶濬宣。

信中提到的西山之游、国学之游，皆金石同好们邀约在一起，为获取金石碑拓而组织的活动，此乃缪荃孙收藏金石碑拓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西山行期原本定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四月廿二日辰刻，据《越缦堂日记》知，后推迟一天，改在四月二十三日^③，同行者有李慈铭、陶心云、徐仲凡、缪荃孙，历时四天，于四月二十七日返回。

国学之游本在西山之游后行期已定，缪荃孙因身体缘故，书写此信要求更改日期。但翻检《越缦堂日记》，直到八月十六日陶濬宣来李慈铭处告别，未查到此信所提国学之游。故很有可能陶濬宣在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离京前，此次国学之游未能成行。故此信写作时间基本可以断定为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四月二十七日西山之游后、仲秋节之前。

三

心云仁兄同年：

新拓片曹恪碑弟未藏得，如在十千以内，弟愿购其一也。嵩高灵庙碑五千可得。呈上张石州^④二种，价给票十三千可矣。弟荃孙顿首。

《曹恪碑》是北周碑刻的代表，“正书，天和五年（570）十月，在山西安

①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：“手书拜悉。越缦先生因昨闻雒原之赴，遂阻蜡屐之游。西山行期，子涵与诸同人约定廿二辰刻启行。敬以奉告，祈为预备。至国学之游，止得俟西山返轮后矣。亦以奉告，当一面转复子渊也。并约游西山。子虞甚为快快，今日出城，匆匆即返，亦遂阻清兴，同游者与吾兄共五人耳。手请小山先生同年开安。小弟濬宣顿首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674页。

②杨洪升：《缪荃孙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98页。

③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四月二十二日：“夜心云书来，言可缓一日行。”

④张石州，即张穆（1805-1849），清定平县人。道光时优贡，官白旗汉教司。精治经史，善言地理，兼好金石碑版。工书法，篆籀尤善。

邑”^①。此信写作时，缪荃孙和陶澐宣都还未藏得《曹恪碑》，但陶澐宣在光绪十八年六月作《稷山论书诗》^②时已谈到《曹恪碑》：“北周碑刻无多，《谯郡太守曹恪碑》结体略似敬史君而神骨天成，笔能屈铁，强独乐为文皇造象碑，题额精严遒丽，下启率更^③。若假定此时陶澐宣已收藏《曹恪碑》，则此信写作时间应在光绪十八年六月前。

《嵩高灵庙碑》立于北魏太安二年（456），石在河南登封中岳嵩山，寇谦之立。黄叔瓚《中州金石考》谓其“字体近拙而多古意”。此碑作为北朝最古之石，以隶入楷书，多用方笔却具圆融浑厚之味，继承了钟繇、蔡邕的正统书风，与刘宋大明二年（458）云南《爨龙颜碑》如出一辙。其结字大小、欹侧均不一统，间杂隶法，然平中有侧，欹中有正，独具天趣。结字上紧下松，宽纵与沉稳有机结合，不失为北碑之妙品。康有为十分欣赏此碑，认为其碑阴“如浑金璞玉，宝采难名”，可列为“神品”，其碑文“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”，可列为“高品”^④。

四

心云仁兄同年：

曹恪碑收入八千不为贵。唐幢七叶，失年月一叶，不完物也。韩永义造象五千可得，并非新出者。弟荃孙顿首。

此信与上函都提到收藏曹恪碑之事，可以判断两信写作时间一前一后，相隔不会太久。由于缪荃孙“自二十一岁有志金石之学，身自搜访，手自椎拓”^⑤，其学问也以金石最精，陶澐宣非常欣赏缪荃孙对各种金石文字的熟悉程度和鉴赏能力，缪荃孙提供的价格为陶澐宣收购金石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
“造象纷纷徧（遍）魏齐，南朝片石惜留题。空山妙相寻遗迹，不道龙门渡会稽”^⑥，陶澐宣认为，南朝造象传世极少，以会稽妙相寺齐永明六年（488）造维卫尊佛为最古。“齐刻存今天壤间止此一石，而幸在吾邑，真墨林至宝也。予藏有梁天监四年（505）苏州吴县顾廷谦造象、大同十年（544）陈宝齐造象、大同元年（535）比丘释慧影造象，皆极难得”^⑦，可见陶澐宣光绪十八年作《稷山

①缪荃孙：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卷二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刻本。

②陶澐宣《稷山论书诗》自跋：“光绪壬辰（1892）夏六月中旬……将出都，直霖雨，滂沱连日，夜不止……南行阻道……成此百咏。”

③《稷山论书诗》，绍兴图书馆藏。

④康有为：《广艺舟双楫》卷四《碑评第十八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89册，第48页。

⑤缪荃孙：《艺风堂文漫存》乙丁稿卷三《与顾鼎梅书》，江阴缪氏民国刻本。

⑥陶澐宣：《稷山论书诗》手稿，绍兴图书馆藏。

⑦陶澐宣：《稷山论书诗》手稿，绍兴图书馆藏。

论书诗》时,还未收得韩永义造象。待后来见到韩永义造象时,陶濬宣误以为是新出土的,故缪荃孙信中说,韩永义造象并非新出者。陶濬宣对金石的判断些许与事实不符,令缪荃孙在评价陶濬宣《稷山论书诗》时,说其“语多臆断”^①。由此可以判断出,此信写于光绪十八年(1892)闰六月《稷山论书诗》写成后。

五

心云仁兄同年大人:

天气郁蒸日极,吾兄作何消遣?隶古杜君金石文字尚多,今其持函入谒,酌留是幸。缪荃孙顿首。

杜君金石文字是指唐龙朔三年的《杜君绰碑》,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录有全文。碑缺下载,连额存九尺六寸,广四尺七分,三十九行,每行字数不可考。正书,篆额,在醴泉县昭陵。“此碑残缺,存者虽及千字而可读成文者不及其半”^②。据《金石萃编》所录可读文字可以看出,碑主姓杜、名君绰,文馆高正臣书,万宝哲刻字。

唐初之褚遂良,书负盛名。高正臣风骨凝重,精光内含,是善学褚者。处于昭陵的《杜君绰碑》是清代仅存、由高正臣所书的两碑之一。“碑之工拙,系于刻手,其重如此”^③。故前人镌碑,必求能手。褚书多由万文韶刻,万文韶则擅名久矣,万宝哲与万文韶同时,亦以刻褚书出名。

拓本虽以先后为别,然后拓之精本,竟有胜于旧拓者。叶昌炽所得昭陵诸碑,虽是道光间拓本,其中的《杜君绰碑》却比乾隆年间王昶《金石萃编》所收溢出二三百字。叶昌炽与缪荃孙往往得一拓片则千里传檄相告。缪荃孙得到叶昌炽新藏《杜君绰碑》后,用隶古方法,考校出多个原本无法辨认的碑上文字。

六

心云仁兄同年:

手示敬悉。查恂叔^④《石径山游记》有单刻本呈览(与《铜鼓书堂集》同)。此上。弟荃孙顿首。

①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十八年(1892)闰六月十九日:“陶心云见跋《论书绝句》,语多臆断,与廖季平之解经仿佛,中采荃孙语,归之吴清帅,岂以官卑不堪称引耶。”

②王昶:《金石萃编》卷五十四,中国书店,1985年。

③叶昌炽:《语石》卷六,第183页。

④查恂叔(1714-1781),清顺天宛平人,原名为礼,又名学礼,字恂叔,号俭堂,一号榕巢,又号铁桥。查为仁弟。入贡授户部主事,累擢川北道,从攻金川,专司督运西路粮饷。官至湖南巡抚。嗜古印章及金石书画,收藏甚富。工书画,尤善画梅。有《苾题上方二山纪游集》、《安南纪略》、《铜鼓书堂集》、《铜鼓书堂藏印》等传世。

柚岑^①早回。

此信写作时间不详。信中所提《石径山游记》和《铜鼓书堂集》，作者皆查恂叔。

京师四面皆山，石径山“西南为芯题上方，其峰异壑，秀甲畿辅”^②，然宦游至都下者，足迹罕至。此山虽与查恂叔家乡甚近，但因种种原因，两次出游都未成行，为践前约，查恂叔与岱瞻上人、万循初^③、辽阳高季治凡四人于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八月十七日从天津北门出发，“自东峪西峪，以至摘星陀、石经洞，穹峰邃谷，穿挟殆尽”^④，往来凡半月，“足迹所至，随手记纂，又复系于咏歌”^⑤，便成此游记。《石径山游记》单刻本，即世楷堂藏版《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》一卷，曾被清朝张潮收入《昭代丛书癸集·萃编》卷四十三。今编入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六三十册，归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。

《铜鼓书堂集》又名《铜鼓书堂遗稿》，三十二卷，为查恂叔之诗、词、文集，歿后由其子辑刻，故称遗稿。卷二十九收游记十二首，其中一首题为《游芯题上方二山日札》，文字与单行本《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》同。所不同者，略去了游中所得“写物清肖、考古详贍”的五十余首诗歌。

七

心云仁兄同年有道：

春间奉手书，满拟三月初畅聆雅教。

兄需保安寺房，于二月初定到三间，窗明几净，月价六金，另一间为厨房，位置已安。候至初八入闾，不见兄到，询苑客方知兄抱恙已回嵇山，不胜怅惘。拟即致函问候，而考信忽降，抢攘廿日。考劣等罚俸。弟之不才，原无所怨尤，然以一字之讹，加以严谴，考起诸公有不正讹一字者，此古所谓高下在心是也。从此万念俱灰，何所系凭。差亦未考，于五月廿一乞假出都，昨日到沪矣。眷属尚留京师，俟弟定居，专价迎之。从此跌宕湖山，研究文字，犹胜软红尘中仆仆道途也。

兄近来大愈否？何日赴广？弟钞《五礼新仪》木斋^⑥书，不能带出京城，

①柚岑即吴柚岑（？-1894），江苏扬州人。著有《西域考古录》、《俄海日记》、《俄游汇编》等。

②《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》沈懋直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3册，第161页。

③万循初即万光泰（1717-1755），字循初，一作晴初，号柘坡，秀水（今浙江嘉兴）人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进士（一作举人）。工诗，善山水，笔墨潇洒，气味纯古，尤善篆刻，兼精算学。

④《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》沈懋直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3册，第161页。

⑤《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》沈懋直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63册，第161页。

⑥木斋即李盛铎（1859-1935），字义樵，又字椒微，号木斋。江西德化县人。

移交静三^①管照。静三散入水部，意兴顿颓，然已派庆典，明年以知府分发候补，犹胜于弟也。季直^②大魁，常熟一人^③之力。字已退息生，并有讹字累句，有人照应，不妨也。嘉兴沈卫书法冠场^④，无凭藉人至第五而止。试问前四人力量，沈能及之乎？凡事如此，人巧夺天，类推可悟。此布，敬请著安不一。年小弟缪荃孙顿首，六月初六日沪江寓舍寄。

初八退房，寺僧晓舌之至，给与一月房钱，颇不愿意。

保安寺僧收房银贴并呈：

三月初十日收到

缪宅房银陆两正（计壹个月的）。

保安寺住持郎具

根据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可知，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六月六日上海寓所^⑤。此年逢太后六旬万寿，特设甲午万寿恩科。陶澐宣自光绪二年中举后，多次进京会试，都未如愿。受张之洞广雅书局的邀请，缪荃孙和陶澐宣于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先后抵广。与缪荃孙居广不足三月不同，陶澐宣直至光绪二十年基本任职广雅书局。期间也曾于光绪十五年、光绪十八年入京参加会试，结果都名落孙山。光绪二十年甲午万寿恩科，是陶澐宣第八次进京会试^⑥。从《艺风老人日记》中可知，陶澐宣致信缪荃孙，要求缪荃孙帮着预订房屋，以便入京会试时居住。缪荃孙于二月十二日“接陶心云信，代陶心云定保安寺房屋”，可候至三月初八入闱的时间，缪荃孙仍不见陶澐宣到来，询问陶澐宣的同乡、好友李慈铭方知，陶澐宣因病已回老家，缪荃孙于是在初八当天来到保安寺退房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记载三月十一日“付保安寺和尚四两，代心云付房钱”，而寺僧所开收据时间为三月初十日，且信中提到的租金和寺僧开具的收据都显示了月价六金，时间与金额均稍有出入，不知何故。

对于此次恩科的考试结果，缪荃孙亦表达了对科场黑暗的不满，并在信中对陶澐宣做了开导：“凡事如此，人巧夺天，类推可悟。”张謇能在此次恩科中考取第一，完全凭借了翁同龢的一人之力。张謇从十六岁录取生员起，中经五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（俗称南闱）均未中试。直至光绪十一年（1884）三十

①静三即屠寄（1856-1921），亦字敬三、静山、敬山，号结一宦主人，江苏武进（今常州）人。

光绪进士，历任翰林院庶吉士、京师大学堂正教习等职。在广雅书局时，曾与缪荃孙同校《宋会要》稿本。著有《蒙兀儿史记》、《黑龙江舆地图》、《黑龙江舆图说》等。

②季直即张謇（1853-1926），字季直，号啬庵，江苏海门人，祖籍常熟。

③常熟一人指翁同龢（1830-1904）。

④沈卫（1862-1945），字友霍，号淇泉，晚号兼巢老人，亦署红豆馆主，系沈钧儒十一叔，浙江嘉兴人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进士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补殿试，中第五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后任甘肃主考、陕西学政。善诗文，工书法，晚年寓居上海鬻字，名播江南，被推为翰苑巨擘。

⑤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二十六月初六日辛亥：“发陶心云信。”

⑥陶澐宣《稷山论书诗》自跋：“光绪壬辰（1892）夏六月中旬，予弟七上春官。”

三岁,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,子弟依例回避,转赴顺天府乡试(俗称北闱),才取中第二名举人,俗称“南元”(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),声名渐著,成为“清流”着重延揽的对象,常熟人翁同龢此后就有了提携之意,“期许甚至”。后来张謇四次参加会试,翁同龢都“荐而未中”,还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。光绪二十年(1894)慈禧太后六十大寿,设恩科会试,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。此次恩科,翁同龢提携张謇志在必得。二月,礼部会试,张謇取中第六十名贡士;三月,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,“初定十一,常熟师改第十”;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,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,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,匆匆评阅后,竭力加以拔擢。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,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,还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:“张謇,江南名士,且孝子也。”最终,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,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。所以缪荃孙在信中说:“季直大魁,常熟一人之力。”此次恩科,前四名(张謇、尹铭绶、郑沅、吴筠孙)都是有后台的,而嘉兴人沈卫虽书法冠场,由于科场中没有凭藉人,最终也只能排到第五。此后,陶澐宣彻底看清了科场和官场的黑暗,绝意仕途,回乡隐居。

缪荃孙自光绪三年授职编修后,基本上供职于京师。清代对于官员政绩的考核,除一年一度的京察外,还有三年一次的考差,另外就是时间隔得更久一些的大考。在光绪十四年前的京察中,缪荃孙基本上都是一等。但自光绪十四年缪荃孙因办《儒林传》与徐桐^①议不合,而后事事为难。缪荃孙在自订的《艺风老人年谱》中详细记载了与徐桐发生矛盾的始末:“(光绪十四年)五月整理《儒林》等五传,撰成稿本,托陆提调呈堂。自辛巳潘文勤师为总裁,廖谷似(寿丰)为提调,奏办儒林、文苑、循良、孝友、隐逸五传。张幼樵(佩纶)、陈伯潜(宝琛)为总办。壬午荃孙传到,即充分纂。谷似外简,王小云(貽清)为提调。幼樵署副宪,改派钱馨伯。伯潜出为江西学政,改派汪柳门(鸣銮)。癸未文勤师丁忧,徐荫轩相国(桐)为总裁。小云丁忧,柳门出为山东学政,馨伯辞退,改派李慈园(端芬)、邓莲裳(蓉镜)为提调。谭叔裕(宗浚)及荃孙为总纂。叔裕外简,荃孙独任其事,成《儒林传》,上二十二篇,下四十九篇,《文苑》七十四篇,《循良》四十三篇,《孝友》二十九篇,《隐逸》十五篇。分并去取,略具苦心。中有金人潜之于徐相国。相国不知是非,以先入之言为主,随加挑斥,埋没苦心。……特旨宣付国史馆者:刘绎之空疏、李春之鄙俚、吴观礼之庸下、李联琇之拘滞,均不足以立传。”徐相国认以纪大奎所著书命编入儒林传。荃孙

^①徐桐(1820-1900),清朝大臣,字豫如,号荫轩。汉军正蓝旗人。道光三十年(1850)进士。历任太常寺院卿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体仁阁大学士等职。因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得到了体仁阁大学士的衔位,又被时人称为徐相国、徐中堂。顽固守旧,嫉恶西学。1898年戊戌政变后,因不择手段攻击新党,得慈禧信任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,自缢死。

为言：“易有经学之易，有术数之易。所以朱子注《参同契》，四库列之道家，而不收入经部。以此为例，大奎似未便补入。”徐亦首肯，而奔走学院之门者如李珣琛、王廉、蒋璧方等群蹇荃孙恃才独断，渺视前辈，以激东海之怒。命官磨蝎动遇小人，夫复奚言。

据《艺风老人日记》载，光绪二十年三月十八日缪荃孙得大考信，三月二十六日保和殿大考，三个题目分别为“水火金木土谷”赋、“书贞观政要于屏风”论和“杨柳共春旒一色”诗（七言排律）。在二百零八份大考卷中，初阅结果缪荃孙原定为三等一名，后经徐桐、张之万^①两相国和翁同龢尚书复阅后，抑置三等之末一百二十四名，四月八日得旨受到罚俸两年的处分。自三月十八日得到大考信到四月八日得旨罚俸两年，故曰“抢攘廿日”。缪荃孙认为此事不公，自己仅仅因为“一字之讹，加以严谴”，而同考的诸位官僚还有不止讹一字者，却没有受到处分。缪荃孙思来想去总结出原因，是因在史馆与徐桐论事不合，徐桐有意求疵。《翁同龢日记》对此次复阅作了详细记载：在三人复阅大考卷的过程中，皇帝曾次多传旨：“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动外，余皆可动”、“在上书房当差者可酌提前”、“有疵之卷可置不列等”，“遵旨改定三卷，拟改后者二卷，拟改前者一卷，三等末廿名重排定”^②，这些影响了此次大考正常的排名顺序。排名顺序的不公正，引发了缪荃孙弃官出游的心思。等缪荃孙处理好京中各项事宜，如将已钞《五礼新仪》交给静三后，便于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请假出都，带着儿子永禄回乡省墓了。六月到达上海，六月六日书此信给陶澐宣。此后缪荃孙与友人游山玩水，带着眷属在书院讲学，得空刻印大量丛书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闲适的十年。

此信集中反映缪陶二人当时的生活状态：缪荃孙不满官场黑暗，弃官出游；陶澐宣不满科场腐败，回乡归隐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
①张之万（1811—1897），张之洞兄。字子青，号銓坡，直隶南皮（今属河北）人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进士。同治间署河南巡抚，移督漕运，历江苏巡抚、闽浙总督，光绪中官至东阁大学士。

②《翁同龢日记》光绪二十年甲午。